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阅读·连载

有一天,我会给你赢一个世界杯

终场哨声响起,看台上数千球迷哭了起来。那一刻巴西国内有多少人流下眼泪,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当时球场内的气氛太压抑了,在乌拉圭的队员们等着儒勒·雷米特——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世界杯的创始人——走上球场为他们颁发奖杯时,其中有些球员心里想的只是快点跑到更衣室里去。“我比巴西人哭得还厉害,”乌拉圭打入第一个进球的斯基亚菲诺说道,“因为我能看到,他们太痛苦了。”

马拉卡纳球场外面,愤怒的球迷点燃了一堆堆的报纸,其中就包括那份贸然宣称巴西是冠军的报纸。球场并未烧坏,但市长立在门口的雕像被人们推倒了,还将其脑袋扔到了附近的马拉卡纳河里。几个小时之后,巴西队员们茫然地从球场里走出来,其中几个恍惚着走进附近的酒吧里,一连几天在里面借酒消愁。为巴西队打入唯一进球的弗里亚卡被一群球迷认了出来,他们朝他大喊着获胜的乌拉圭队员的名字:“奥布杜里奥!”“吉贾!”“弗里亚卡说:“那些喊声,我一辈子都忘不掉了。”

在随后的数周、数月时间里,这种悲伤的情绪与日俱增。赛前的大肆宣传已是耸人听闻,现在的哀伤和反省比之更甚。在人们看来,我们就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巴西战败,伤亡无数。他们认为,这场比赛不是11名队员技不如人,而是整个国家的挫败,它说明巴西永远都摆脱不了“落后”的禁锢。有些人甚至灰心丧气地说,巴西永远都不会赢得世界杯,永远都不能跟世界强国一较高低。

甚至一些很客观的人也认同这种观点。著名的人类学家罗伯特·达麦塔说,这场失利是巴西现代史上最惨的悲剧,因为它使人们相信,我们的国民都是失败者。雪上加霜的是,这场失利恰恰发生在这个国家刚刚有了点梦想的时候——在体育项目上,在国家声望上;我们冒着风险,刚想施展一下手脚,就碰壁了。又过了很多年,巴西的国家自尊心才得以恢复。“每个国家都有无可挽回的大灾难,就像遭受核弹的日本广岛。”巴西体育记

贝利:足球之美(6)

◆ 贝利 & 布莱恩·温特(巴西)著 吴果锦 译

者尼尔森·罗德里格斯这样写道,“而我们的灾难,我们的广岛,就是1950年败给乌拉圭。”另一位记者罗伯特·姆伊莱特还将吉贾打入制胜一球的黑白录像与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的镜头进行了对比,说它们“有着同样的情节……同样的动作、节奏……同样精确无情的运行轨迹”。

1950年这批巴西国家队的球员们随后在各自的俱乐部球队里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令人悲哀的是,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获得世界杯冠军。有些人到死都念念不忘那次近在眼前的机会。济济尼奥,那届国家队里我最喜欢的球员,他说他把世界杯亚军奖牌放在奖品箱子的角落里,任其氧化黯淡。“我不愿擦它,”多年后他如此说道,“在巴西,足球亚军就是废物,还不如打不进决赛。”尽管他极力想要忘记,别人却不放过他。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每年的7月16日,济济尼奥都会接到电话,“要是不接,它就会响上一天。巴西各地打来的电话,问为什么我们输了那届世界杯。”

有一些球员承受的痛苦比别人更大,那就是黑人球员。著名记者马里奥·菲里奥在《巴西足球里的黑人》一书中说,很多巴西人都将此次失利归咎于巴西的“人种劣势”——一个让黑人球员出赛的黑人国家总是低人一等的。这种观点无疑是迂腐而令人作呕的,但事实——或巧合——恰恰佐证了这种说法,因为巴西国家队的两位“最黑的”球员都跟乌拉圭的两个人球有关。“小胡子”是负责盯防斯基亚菲诺的人,而后者打入了乌拉圭的首个进球;在此后多年时间里,“小胡子”一直被奚落为“懦夫”。他此后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不愿跟国家队的朋友们来往,因为他怕有人会提到那场比赛。还有守门员巴博萨……他承受的指责更多、更重。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多次见到过巴博

萨。他住在里约,那届世界杯之后继续为俱乐部踢球,直到41岁才带着诸多荣誉退役。但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人们的指摘、嘲笑和埋怨,几十年后依然如此。1994年他想到特雷索波利斯(巴西东南部里约热内卢州一座山区城市,是巴西国家足球队的训练基地所在地)的训练场探望国家队,希望能在他们去参加美国世界杯前为他们鼓劲送行,但被对方拒绝了,因为他们认为巴博萨是个“灾星”。他于2000年4月去世,在世的时候他曾数次对我和别人说:“在这个国家要是犯了罪,最高量刑是30年,我不是罪犯,却过了远远超过30年的牢狱般的生活。”

其实,巴西的失利并不怪巴博萨,也不怪其他队员。济济尼奥说,所有妄自尊大、目中无人的言论,不论是在报纸上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你亲手赠给敌人的利刃”。科斯塔教练则将失利的原因归咎于“在球迷、媒体、管理者身上泛滥的‘我们已经赢了’的气氛”。巴西是被自吹自擂杀死的。每个想借世界杯谋利的人——尤其是那些政客——都应该为失利承担责任。他们凭空造出力不能及的期望值,而当现实超出了他们的预料时,巴西队就注定了失败。

“打败我们的不是乌拉圭的第二个进球,”科斯塔教练说道,“而是第一个。”话虽如此,很多人还是不会接受这种解释。悲哀的是,马拉卡纳失利的阴影至今还笼罩在我们心头。巴博萨说,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日子不是1950年7月16日,而是20年后一个普通的下午,一位妇女和她年幼的儿子在商店里认出了他。“看,”那个女人指着巴博萨对儿子说,她的声音很大,足以让巴博萨听得清清楚楚,“就是他伤了全国人的心。”

大家也许会问:你开始时不是说1950年世界杯对巴西是件好事吗?请听我解释。的确,那届世界杯的结果令人大失所望。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

[美] 迈克尔·富利洛夫

6.他的思维如瑞士钟表般精确

在这变幻莫测的关头,罗斯福决定派出他的私人特使去欧洲,与一个关键的中立国和三个主要交战国进行磋商,它们是意大利、德国、英国和法国。他所选择的人是杰本·萨姆纳·韦尔斯,曾被《时代周刊》描述为“能够塑造上峰梦想的外交官”。他身材高大,前额突出,漂亮的鼻子,整洁的小胡子。韦尔斯总是俯首面对谈话人,他精通三门外语,按照一位大使的话说,他的思维“仿佛是瑞士钟表”般精确。韦尔斯声音低沉,语调优雅,穿着得体。他带有主教般的尊严:当他到国会作证时,他的出现使整个环境黯然失色。一位观察家把韦尔斯的自控能力比喻为外科大夫。不过人不可貌相,在其高傲的举止背后,隐藏着寻欢作乐的内心,他的好奇心导致了最后的灾难。

韦尔斯1892年10月14日出生在纽约一个古老和显贵的新教圣公会家庭。韦尔斯家族自1636年就来到美洲,其阶层包括政治家、传教士和学者。阿斯特家族和舍默霍恩家族仿佛斑鸠一样依偎在韦尔斯家族谱的主干上。伊迪丝·华顿是他的伯祖母,而他仿佛是出自她的一部小说中的人物。他继承了所喜欢的伯祖父的中名,伯祖父是来自马塞诸塞州大名鼎鼎的废奴主义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

本杰明和弗朗西丝·斯万·韦尔斯让他们的孩子萨姆纳和艾米丽在富有的社交界名人圈中成长。夏天,他们在长岛南岸的韦尔斯家别墅度过,那里有马厩和花房。玩耍的伙伴都来自附近的显赫家庭,据说,不戴上白手套,萨姆纳是不会出去和他们玩耍的,虽然这一说法有些荒唐。据说,当萨姆纳到42街卡尼女士办的男生走读学校上学时,10岁的他没有选用当时时髦的旱冰鞋,而是选择了步行。第二年,父母给他在他尼克博克·格雷斯报了名,那是由第七团军械库举办的学生军训队,位于派克大街和67街之间,参加训练的学生都来自纽约上层社会家庭。“格雷斯军训队教了他很多东西,”韦尔斯的儿子和传记作家回忆说,“他终身都像卫兵那样身板笔直。”



在他快满12岁时,韦尔斯又去了格罗顿公学上学,那是一所预科学校,由恩迪科特·皮博迪牧师创办,学校位于波士顿郊外的美丽的田园风光中,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母校。作为“强身派基督教”的使徒,皮博迪对20世纪中期美国精英阶层的教育有着深远影响。他给小伙子开出的药方是:冷水浴、体操和教堂。这些对饱受娇惯、不好运动的韦尔斯简直是当头一棒,他喜爱的歌剧和日本艺术。1910年,他从格罗顿公学毕业后进入了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在格罗顿公学东南方,相距仅30英里远(约48公里)。在他一年级期间,他亲爱的母亲弗朗西丝去世,从此,他一生都佩戴黑色领带以示对母亲的哀悼。

韦尔斯并不是非常适应哈佛的生活,但他在波士顿后湾区富丽堂皇的上流社会圈子找到了更多的意气相投的伙伴,各种堂兄表妹和家庭的朋友引他跨入了门槛。就在这个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他邂逅了第一任妻子,法定继承人埃丝特·斯莱特。他也经常出没于波士顿其他不太优雅的场所。他拼命将所有的课程用三年学完,最后一年与格罗顿公学时的一个好友去了巴黎,本来他声称是学建筑,实际上是遍尝美丽年代之都的各种享乐。多年后的巴黎女性都被这个高贵的年轻美国男人所迷惑,他的黑色围巾,灰色鞋罩和金色顶端的手杖。直到欧洲卷入战争,韦尔斯才返回美国。

1915年,韦尔斯在外交考试中名列前茅而进入了国务院这个外交社会。他的申请得到各种显赫的亲戚和关系的支持,包括海军部副部长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支持。他写道:“韦尔斯将在工作中证明自己。”这两位格罗顿公学的校友因为家庭关系而亲密起来。小时候的萨姆纳·韦尔斯曾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莉诺的婚礼上扮过小男傧相,在婚礼上,由新娘的叔叔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牵出了新娘。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预期相符,韦尔斯在他出任东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久,就证明了自己是模范外交官。拉丁美洲则让他终身爱上了外交职业。其文化中声色犬马的方方面面与他性格中的另一面一拍即合。否则,人们只看到他性格中的严肃正经,让其妻子埃丝特悲哀的,是韦尔斯在阿根廷有多个情人。

7.这让他骑虎难下

章承德回到他的写字间。他的写字间在3楼,面向黄浦江。章承德站在写字间落地窗前,看着外滩万国码头上了一幅忙碌的画面。一艘洋轮巨大的烟囱吐出黑烟,随时都可以起航。洋轮甲板上,几名外国水手训练有素解开缆绳,为起航做准备。在这艘洋轮边上,停泊着的几艘洋轮舱门大开,黑洞洞的像吃人的怪物,许多中国苦力扛着比他们身体大多大的硕大货包,吃力地把货包挪进黑洞。这个情景,让承德想到了蚂蚁。小时候,承德常常看蚂蚁驮物,很大一粒米饭,体积差不多是蚂蚁的好几倍,但是小小的蚂蚁却能驮着进洞穴。

章承德仔细盘算,彼得罗先生托他出手的货,还剩下上万桶火油,几千吨煤炭,这些火油煤炭加起来现值5万银两。照理说,做了彼得罗的这笔生意,章承德收回的钞票,老早就超过20万银两了。

但是他却一时凑不出20万银两。他用这些银两开了一家火柴厂。

章承德本来没有这么大胆量,敢挪用彼得罗先生的货款办厂。促使他办起这家火柴厂有两个原因。原因之一是彼得罗先生曾经给他透露过,等这批货物出手,准备办一家火柴厂。彼得罗先生是位精明的英国商人,他看到中国巨大的火柴市场,如果在上海办一家火柴厂,只要两年,甚至于一年,就可以收回成本。可惜彼得罗先生来不及实施他的计划就回天了。第二个原因是,彼得罗先生刚走不久,承德的同乡好友天敏从国外留学回来了。天敏姓郑,是与承德同一条沙船到上海的。旅途3天,他与天敏结下了深厚感情,当时大家相约,以后无论哪一个发达了,一定要相互帮衬。天敏到上海后,读了几年中学堂,以后又到教会学堂读了两年书,之后就到国外留学去了。天敏在国外学的专业就是制造火柴。去年,天敏回国,闲谈中说起他学的技术,言者无心听着有意。几番交谈,承德萌发了办火柴厂的意愿。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天敏,天敏立刻说好啊啊好,你德兄有本钱办火柴厂,所有的技术我给你担保了,不是我吹,你那个火柴厂用不了一年,就可以赚回投资!一贯低调的天

敏破天荒拍着胸脯向承德保证。

天敏这一表态,拨动了承德的心弦,他仔细斟酌了几天,觉得机会难得。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周全:用彼得罗的部分货款和自己的赚头办厂,等彼得罗先生回到上海,他就可以用火柴厂的赚头付清货款,而且,他要向彼得罗先生说,这火柴厂的股份有他彼得罗先生一半,他觉得这样做彼得罗先生肯定会同意,这也是承德感谢彼得罗先生的最好报答。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彼得罗先生居然不回来了。这让他骑虎难下。

咋办?咋办?章承德真是急坏了。他仔细盘算过,他已经在火柴厂投入30多万两银两,身边已经没有多少余钱,就是现在把全部货物出手,也就是六七万银两,距离彼得罗先生要的20万银两还有十多万两差距。

假如再给他半年多时间,他坚信火柴厂可以盈利,因为他的火柴厂马上就可以投产了,加上他几家五金商号的赚头,他完全可以付清彼得罗先生的货款。但是现在,现在他只有10天,要在10天里凑齐20万两银两。

他决定借贷,即便利息高一点也可以。他把这个想法与天敏商量,天敏沉思了半天,说可以试试。天敏给他算了一笔账,现在火柴厂就可以开工了,按照工厂规模,每个月赚上两万银两肯定可以,如果十多万银两借贷一年,加上利息也不到20万两,想想没啥大风险。听天敏这么一算,承德心里有了谱了。主意定下,于是,他吩咐手下把货单挂到交易所,自己坐车回到在虹口的五金号。他已经有10多天没有去五金号了。

自从接手洋行事务以来,承德对经营自家五金号的精力投入很少。弟弟承忠为人老实,承德把店交给承忠打理。承德不指望承忠能给他赚大钞票,但是他相信让承忠管事,大钱赚不了,大事体也不会出现。对承忠经营那店里业务,承德只希望不蚀本就行了。几个月下来,承德查了店里的来往账目,觉得总体还行,店里还有些赚头。承德对此已经很满意了。

“阿哥,依回来啦?”听到门外传来马车铃声,承忠赶紧从店里迎了出来。承忠也穿着与承德一样的二茬剪羊毛马褂。兄弟俩相差两岁,长得很像。

宁波商人

徐志明

